

明清時代商人 及商業資本

傅衣凌 著



人民出版社

429195



2 017 0108 8

明清時代商人 及商業資本

傅衣凌著



人民出版社

1956年·北京

明清时代商人及商業資本

傅衣凌 著

*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东总布胡同10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1号

北京新華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开本 787×1092 公厘 $\frac{1}{32}$ · 印張 $6\frac{7}{8}$ · 字数160,000

1956年7月第1版

1956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6,000 定价(7)0.60元

統一書号11001·137

目 錄

一	明清时代商人及商業資本發展概述·····	1
二	明代徽州商人·····	49
三	明代江苏洞庭商人·····	92
四	明代福建海商·····	107
五	明代陝西商人·····	161
六	清代前期东南洋銅商·····	176
七	清代前期厦門洋行·····	198
	后記·····	215

一 明清时代商人及商業資本發展概述

在中國封建經濟史上，明清时代無疑的是一个重要的轉捩时期。这本小册子是就我所搜集到的有关于明代和清代前期的商人及商業資本的史料，初步整理出來的。希望通过这些具体史料，俾能有助于中國歷史的研究。但本書的寫作，当初只是作为个别論文被提出的，各章之間的內在联系和綫索，是不够清楚的。所以这里想先作个鳥瞰式的敘述，并把我所搜集到的有关于这一方面的史料，而为下文所未引用的，也附述于此，以供参考。

中國的商業和商人活动，是很早就有的。在战國及秦漢之交，我們即看到这时商人在商品流通过程中，开始活躍起來，于是中國各地遂出現了“治產業、力工商、逐什二以为务”的專門商人了。据“史記”“貨殖列傳”所載关中、洛陽、三晋、山东、陈宛之間，随处都可以看出以經商为專業的人們，其中，“宛周齐魯，商徧天下”，最为著名。并且他們或行賈郡國，或鉄冶起家，皆累積有巨額的財富。后來到了漢武帝时虽由于地主經濟的進一步确立，鹽鉄國营的施行，權酷制度的实现，最高的專制帝王把封建社会里最易致富的生意，都一一收归到政府手里，來巩固他們在中國經濟上的支配作用，阻碍了商人和生產的联系。然而这不就等于說自是以后，中國商人和商業資本便不活动了；反之，他們还是照样的向前發展，并跟着中國封建地主經濟的發展，从占領

地区的擴大，就是以面的擴大，來追求利息，增加財富的累積。隋唐大統一時代之，中國商業的繁盛便是建立在这个因素上面的。但比較的說來，使得中國商業規模的擴大、商人財富的累積和商人的社會地位的提高⁽¹⁾，則在宋元時代中國封建經濟的發達、地主階級的豪侈生活、特別是中國的廣大人口所造成的消費市場的相對擴大，以及國外市場的開拓，確曾把中國商業資本帶到一個新的階段，舉凡大商業所需要的許多配備和機構，差不多都一一完成了。詳言之，在商人之中，出現了坐賈、客商、牙僧等，各產業部門都有他們在活動。大規模的聯號組織也已出現。跟着商業的發達，于是為便利大商業的進行，像貨幣金融及其他的輔助機關——場房、廊房、堆棧場、櫃坊、錢鋪、金銀鋪、兌房、寄附鋪、交引鋪等機構，以及商業經營上所必要的簿記⁽²⁾、商用數字⁽³⁾、珠算⁽⁴⁾等，亦無不出現於這一時期，較之同時代的歐洲商業顯有極大的進步。為了這許多發展商業的先行條件的完成，首先，我們應指出的，即是商人的巨額財富的形成。拿宋代來說，我們知道宋代商人的財力是雄厚的，如蜀商、南商、北商等都是當時有名的地方商人，其占近世中國商業界中堅的山西商人⁽⁵⁾、徽州商人⁽⁶⁾，也大体在這時開始顯出身手。據文獻的記載，當真宗天禧四年（一〇二〇年），成都的交引鋪曾以十六戶組織聯號，發行交子，其發行額達百數十萬貫。而京師的金銀商、交引鋪更有力量。徽宗崇寧四年（一一〇五年）間政府所發行的交引約共三百五十萬貫，僅以四、五戶盡數承購。為表明宋代商人財力的富足，下例又可作證明，即當北宋末年金軍南下之時，政府曾大刮交引鋪、質鋪、金銀鋪、絲帛鋪等，一鋪動輒以千萬兩計。特別在宋代，由於當時封建經濟的高度發展，農業、手工業都有很

大的進步，促進了商業和城市經濟的繁盛，這頻繁的交換，自更加活躍了商品經濟。這時出現了人數相當多的中、小商人，他們為爭取貿易的自由，曾起而反抗當時的封建統治階級，北宋時四川王小波原為茶販，而兩宋福建的“鹽寇”〔7〕、湖南北的“茶寇”〔8〕，曾一度大事活動，皆足以表示宋代商人為爭取發展自己經濟的要求。其在元代，蒙古人的入侵，對中國經濟曾進行了殘酷的搜刮與掠奪，并把全中國的商業權交給回教徒的斡脫商人（Ortaq）去辦理。據記載，斡脫商人獨占了中國的對外貿易，經營高利貸的斡脫錢的貸放，撲買天下差發、保官房廊、地基水利、豬雞、酒課、鹽課、河泊、橋梁、渡口，以及各種大商業等等，只要有利可圖的地方，他們都無孔不入。可是蒙古入侵的結果，統一了宋遼金的割據局面，這樣，却使得商業活動的地盤大為擴張；特別是元代驛制的完備，海運的暢通，對各地物產的溝通，起了很大作用。從“馬可波羅行紀”中也可看到當時各城市物資交流的頻繁，如山西太原府、平陽府即有不少的商人，他們曾由此發足前往印度等地經商謀利。南則江浙兩省，多以機杼、海運致富；朱清、張瑄這是誰都知道的江南富戶。稍後的，則有陸道原、倪瓚、顧仲英、沈萬三等，皆是著名的人物。這時江南富戶不僅“富可敵國”，在數量上也是驚人的。茲姑舉明初曾兩度徙天下富戶以實京師資為佐証。前一次在洪武二十四年（一三九一年），命戶部籍浙江等九布政司應天十八府州富戶四千三百餘戶，以次召見，徙其家以實京師；後一次，則在永樂元年（一四〇三年），復選應天浙江富戶三千戶，附籍北京。雖然，在富戶之中不一定都是商人，並包括有一大部分的地主在內，但只此而言，已足見那時商業的發展和其商人人數之多了。

但是到了明清时代，根据本書所搜集的各项資料，顯然的，在这一时期中，商業的規模、商人的活动范围和商業資本的累積，都大大的超越了前一个歷史階段的水平。那末，为什么明清时代会有这样的变化呢？那不用說是有一定的社会生產力的發展为根据的。在这当中，我們应充分認識農民起义对于推动歷史前進的積極作用。据歷史的記載，朱元璋在窃取了農民革命的勝利果实之后，他为着巩固自己的統治、穩定社会的秩序，曾部分的抑压地主豪强对農民的压迫，并適當的解除元代匠戶的束縛，使成为一种民戶。这样，对直接生產者的讓步政策，固然，就解放整个生產力說來，尚是不够澈底的，然而他能将当时絕大多数的直接生產者使其都能从事于生產活动，貢獻是很大的。所以明代初年農業生產曾呈兴旺之貌。

明初百姓十一在官，十九在田。盖因四民各有定業，百姓安于農畝，無有他志；官府亦驅之就農，不加煩擾，故家給人足，乐于为農⁽⁹⁾。

因而这就大大地刺激着中國封建經濟更向前發展一步。这一情况反映在当时的農業生產上，首先是生產工具和生產技術的進步。我們从明末徐光啓的“農政全書”中所見，当时農業上的各个生產過程中的工具都已齐备，特別是江南地区和沿海一帶，这种新的工具和技術曾被廣泛的应用。

在南方的水稻生產中，灌溉起着重要作用，所以一般農家为了防旱蓄水，并減輕人力的負擔，早于元明之际，即利用水轉連磨、水轉翻車等工具，据我們所得的資料，江西等省多用水轉連磨，以供灌田。

水轉連磨……須用急流大水，以湊水輪。其輪高闊，輪軸圍至合抱，長則隨宜。中列三輪，各打大磨一槩。磨

之周匝俱列木齒，磨在軸上，閣以板木，磨旁留一狹空，透出輪輻，以打上磨木齒。此磨既轉，其齒復傍打帶齒二磨，則三輪之功互撥九磨，其軸首一輪，既上打磨齒，復下打碓軸，可兼數碓。或遇天旱，旋于大輪一周，列置水筒，晝夜溉田數頃^[10]。

廣東則有水翻車，以供灌溉。

从化之北，有溪流凡百余里。兩岸巨石相拒，水湍怒流，居民多以樹木障水為水翻車。水翻車一名大輶車，輪大三四丈，四周悉竹筒，筒以吸水，水激輪轉，自注槽中，高田可以盡灌。西寧亦然^[11]。

據屈大均的記載，廣東且有木牛耕具的發明，一手而有兩牛之力。

木牛者代耕之器也。以兩人架施之，架各轆轤一具，轆轤中系以長繩六丈，以一鉄环安繩中，以貫犁之曳鈎。用時一人扶犁，二人對坐架上，此轉則犁來，彼轉則犁去，一手而有兩牛之力。耕具之最善者也，吾欲與鄉農為之^[12]。

這些水轉連磨、水轉翻車，以及木牛耕具的使用，無疑的，對於改進生產技術，提高農業生產力，是有深刻影響的。

其在工業方面，則明清時代關於冶鑄工業和紡織工業等都有一套較完整的工具系統；重要的，是他們能利用天然動力，作為推動工具的動力。這可說是中國原始機械的萌芽。徐光啓曾轉引王楨的“農書”，說在江西一帶早用水轉連磨，以制茶碾谷。

水轉連磨，……此一水輪可供數事，其利甚博。嘗至江西等處見此制度，俱系茶磨，所兼碓具，用搗茶葉，然後上磨。若他處地分，間有溪港大水仿此輪磨，或作碓

輥，日得谷食，可給千家，誠濟世之奇術也^{〔13〕}。

福建、浙江則多用水碓以制紙。

閩中水碓最多，以木櫃運轉（不駛）急溪中，壅急流為之則佳。順昌人作紙，家有水碓，至造舟急灘中，夾以双輪，如飛舂聲^{〔14〕}。

（湖州）東沈錢家邊傍溪分流，激石轉水以為碓，以殺竹青而搗之。累石方空，方廣尋丈以置鏊，以和墜灰而煮之。諺曰：東沈錢家邊，水碓接連牽^{〔15〕}。

水碓惟孝丰以上有之，中虛可容黍數斗，不入而運。或截竹置其中，待水自舂，搗爛如泥，輒用竹帘撈起，堆積蒸曝，便可成紙。今之黃紙白紙是也^{〔16〕}。

廣東則利用翻車、水碓以制香，號曰香水車和香碓。

每水車一輛可供水碓十三、四，所以樟楓鷄藤諸香，舂末以作綫香，謂之香水車^{〔17〕}。

香碓羅浮為多，羅浮眾香之藪也。……山人每采樹之鱗甲，名薰陸羅香者及楓桂鷄藤水栢之屬，以輻車車水。水激處百杵齊舉，而黃屑成焉。乃以浮漚載之，沿羅陽溪而下，售于廣惠二州，凡為香条香餅者皆取給。其香以天生，而末以水成，不費筋力^{〔18〕}。

另在浙江還有浙碓，舂米倍于常碓。

壩碓……一壩可舂米三石，功折常碓累倍，始于浙人，故又名浙碓。今多于要津商旅輳集處所，可作連屋，置百余具者，以供往來稻船，貨糶粳糯，及所在上農之家，用米既多，尤宜置之^{〔19〕}。

而中原地區亦有水轉大紡車。

水轉大紡車。此車之制但加所轉水輪，與水轉輥磨之法俱同。中原麻苧之鄉，凡臨流處所多置之。今特圖

寫，庶他方績紡之家，仿此機械，比用陸車，愈便且省，庶同獲其利^[20]。

据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的記載，当时西北如平涼等地，亦多使用这种用水力發動的磑磨，以治麵造紙。

涇多黃壤，水皆濁流，……溪漲峻駛奔流，方可筏也，咸疏为磑磨，以治麵造紙，灌溉田園^[21]。

在明代，这种磑碓水車的大量使用，一方面是表示这种進步的生產工具，已逐漸从封建貴族的手中解放出來^[22]，而推动民間生產事業的前進；更重要的，这种磑碓、水磨虽然还不能說已完全具备着动力机、傳动机和工具机三部分的原始机械，但它的發展趨勢，有可能逐步形成完整的机器体系，作为產業革命的出發点。

所以和这新的生產工具和技術的出現的同时，在農村和城市都發生了一系列的变化。这就是商品化作物的种植逐漸在農業生產中提高了它底重要的地位。誰都曉得东南蠶桑之利，甲于天下。据“吳兴掌故”云：

大約良地一畝可得桑八十箇，每二十斤为箇，計其一歲垦鋤壅培之費，不过二兩，而其利倍之^[23]。

所以江南農家率多植桑，有达万株者。归安茅氏即是一个著例。

湖俗以桑为業，而(茅)处士治生業喜种桑，則种桑万余唐家村上^[24]。

次則木棉的种植，亦很普遍。江浙兩省的松江、苏州、湖州諸府屬，几無不种之者。

窃惟三区虽隸本縣(崑山)，而連亘嘉定迤东沿海之地，号为岡身。田土高仰，物產瘠薄，不宜五谷，多种木棉，土人專事紡績^[25]。

(苏州)屬邑逐末者少，皆务農力穡。惟太倉、嘉定东偏，謂之东鄉，土高不宜水稻，農家卜歲而后下种，潦則种禾，旱則种棉花黃豆。比閩以紡織为業，机声軋軋，子夜不休。貿易惟棉花布，頗称勤儉^[26]。

吾邑(上海)地產木棉，行于浙西諸郡，紡績成布，衣被天下，而民間賦稅公私之費亦賴以濟。故种植之廣，与杭稻等^[27]。

去南潯之东，百里而遙，地沿海，田之高仰者宜木棉。其鄉民半植此。夏种秋收，采積既多，即捆載而易錢于西賈。潯之西，百里而近，地多岡阜，为茶栗竹木山場。俗少女工，时因其地之所出，亦捆載而易布于东賈^[28]。

这些木棉不單供給本地的需要，且南运于福建等省，所謂“吉貝則汎舟而溯諸南，布則汎舟而溯諸北”^[29]。而明代末年，鎮洋以棉花的收成、銷路均欠佳，曾使農民經濟遭受很大的困难。吳梅村的“木棉吟”及序云：

隆万中閩商庸至鎮洋，采購木棉，州賴以饒。今累歲弗登，价賤如土，不足以供常賦，余作詩紀之。眼見当初万曆間，陈花富戶積如山；福州青鞵烏言賈，腹下千金过百灘^[30]。

此外，則果樹、藍靛的种植也很普遍。茲姑举兩三例如下：

(太)湖中諸山，大概以橘櫟为產，多至千余樹^[31]。

泉州枕山而負海，田再易；園有荔枝龍眼之利，焙而干之行天下。附山之民垦辟磽确，植蔗煮糖，黑白之糖行天下^[32]。

在明清之交的商品化作物中，尤值得一說的，厥为烟草的种植。烟草始于明末傳入中國，种在閩漳，清初即已遍植

于其他地区。

今世公卿士大夫無不嗜烟草者，……初漳人自海外携來，莆田亦种之，反多于呂宋。今处处有之，不独閩矣^[33]。

后至雍正、乾隆之世，則廣東、江南、山東、直隸、湖廣、陝西、甘肅各地，几無不种之者，这种“栽菸牟利，頗夺南畝之膏”，曾引起封建地主階級的反对，但这是沒有效果的。我們知道乾隆时代陝西的漢中，產烟甚丰。如說：

今漢中郡城商賈所集，烟鋪十居其二三。城固涇水以北，沃土腴田，尽植烟苗，盛夏弥望野綠，皆此物也。当其收时，連云充栋。大商賈一年之計，夏絲秋烟。……南鄭城固大商賈重載此物，歷金州以抵襄樊鄂渚，舳舻相接，歲糜金數千万金^[34]。

以上只是一些例子而已。这种商業性農業發展的結果，必然的会擴大地主的貪婪胃口，而更進一步的吞并土地，形成土地的高度集中。明清兩代，除了封建統治者采取政治上的暴力，如用設皇庄、官庄及圈地等方式來掠奪、霸占土地之外，一般地主和商人的集中土地，亦很活躍。叶夢珠曾記清初松江府的土地集中情况說：

谷賤伤農，流离初复，無暇問產；于是有心計之家，乘机廣收，遂有一戶而田連數萬畝，次則三四萬至一二萬者，亦田產之一变也^[35]。

于是到乾隆时代遂形成了“一人据百人之屋，一戶占百戶之田”^[36]的嚴重的社会現象。同时，由于土地集中了，这般地主为滿足他們的奢侈生活，便要求以貨幣代替实物，这就促進了地租形态的变化。我們知道江南諸省田賦，自明英宗以后，即已折征銀兩，而神宗万曆九年（一五八一年），一条

鞭法的頒行，更确定了中國貨幣地租的地位。这种貨幣地租到了清代还是繼續進行的，如“松江府志”載，乾隆元年尚書楊名時奏稱：

婁縣知縣王士瑾請收畢姓田產，每歲租銀一千三百余兩供廩食之需^[37]。

這是說明私人土地亦系征收銀兩，而不是物納。更重要的，則是由于土地的集中，有一部分人离开了土地，形成廣大的流浪的雇傭者層，促進社會分工的發達，把手工業逐漸從農業中分離出來。特別自明代以後，手工業的生產，已開始脫離農家副業的性質，而向着工場手工業的道路前進，並在生產系統上逐漸組成爲一個有機的構成。茲以松江的棉布，蘇州、南京的絲織，江西的陶瓷，廣東及川陝鄂三省的冶鑄為例言之。

松江是棉紡織業的中心。明代松江之布，號稱衣被天下，其主要產地固在鄉村，當“農暇之時，所出布匹，日以萬計”^[38]。但亦很集中，據“松江府志”云：

紡織不止鄉落，雖城中亦然。里媼晨抱紗入市，易木棉以歸，明旦復抱紗以出，無頃刻閑；織者率日成一匹，有通宵不寐者^[39]。

由于棉紡織業的發達，所以明代松江的楓涇、洙涇有布號數百家之多，而與紡織業有關的染色業等也跟着興盛起來了。

前明數百家布號皆在松江楓涇、洙涇樂業，而染坊踰坊商賈悉從之^[40]。

並且擁有相當人數的雇傭勞動者。

康熙初，里中（楓涇）多布局。局中所雇染匠、研匠皆江寧人，往來成群，擾害閭里，民受其累，積憤不可遏，糾

众歛巨資，閉里門水柵，設計憤殺，死者数百人^[41]。

和这江南城鄉的工場手工業的發展相配合的。在松江并萌生有資本主義的家內工業的最初生產形态。事实是这样的：

郊西尤墩布輕細潔白，市肆取以造袜，諸商收鬻称于四方，号尤墩暑袜。妇女不能織者，多受市值，为之縫紉焉^[42]。

即是参加松江的袜的生產过程的，共有三种人。商人通过市肆一經紀以造袜原料發給妇女去制造，按規定条件，付与工資；然后由其收鬻，以之包售于四方。这自使当时尚在家內工作的妇女已成为出賣劳动力的人們，而“受市值”替商人來縫紉的。据范濂的《云間据目抄》：当时松江的暑袜店，有百余家之多。

松江旧無暑袜店，暑月間穿氈袜者甚众。万曆以來，用尤墩布为單暑袜，極輕美，四方爭來購之。故郡治西郊廣开暑袜店百余家，合郡男妇皆以做袜为生，从店中給筹取值，亦便民新务。

这些，虽僅是一小部分的事例，然已足供說明明代的手工業生產，尽管其所表現出來新的东西尚非完备，并且其中基本上仍是受着封建剝削形式的制約，但这新的資本主義的萌芽因素却逐漸孕育滋長于封建社会的母体中，当無容疑。

苏州則是絲織業的中心。明代苏州一地工商業人口即占相当多的数目，关于其具体情况，有如下述：

城中与長洲东西分治，西較东为喧鬧，居民大半工技。金間一帶比戶貿易，負郭則牙僧輳集。胥盤之內密邇府縣治，多衙役廝养，詩書之族聚廬錯处，近間尤多。城中妇女習刺繡。濱河近山人最力穡，耕漁之外，男妇

井工網履緋麻織布采石造器梓人鑿工塋石工，終年備外境〔44〕。

其中机房多在东城，工匠皆計日受值，并有各种不同的專門分工。

郡城之东皆習机業，織文曰緞，方空曰紗。工匠各有專能。匠有常主，計日受值；有他故則喚無主之匠代之，曰喚代。無主者黎明立桥以待。緞工立花桥，紡工立廣化寺桥；以車紡絲者，曰車匠，立濂溪坊。什百為群，延頸而望，如流民相聚，粥后俱各散歸。若机房工作減，此輩衣食無所矣〔45〕。

同样的，染色業也跟着紡織業的發達而興盛起來了。染業多在婁門，据万曆年間曹時聘所說，則專其業者，有數千人之多。

臣所親記，染坊罷而染工散者數千人，机房罷而織工散者又數千人，此皆自食其力之良民也〔46〕。

和苏州占着同样重要地位的南京絲織業，在明清時代也是很有名的。其在乾隆時代的絲織業發達情況有如下述：

金陵机業聚于城之西南隅。开机之家，總會計處謂之賬房，机戶領机謂之代料，織成送緞，主人校其良楮，謂之讎貨。小机戶無其資本，往往恃賬房為生。各机戶復將絲發交染坊染色，然後收回，織成緞匹，再售與綢緞業。四者層層相因，休戚相關。清乾隆迄今，通城緞机以三萬計。紗綢絨綾不在此數。織机之工俗呼机包子〔47〕。

我們從上面的机戶、小机戶、机包子等的分工，并總屬於賬房看來，正是說明商業資本家的控制生產過程和運銷過程的典型例子。

江西景德鎮則系陶業的中心。這一地區的生產情形，
从王世懋的記載，猶可想見當年繁盛的面貌。

江西饒州府浮梁縣，离縣二十里許為景德鎮，官窯設焉。天下器器所聚，其民繁富，甲于一省。余嘗以分守督運至其地，万杵之聲殷地，火光燭天，夜令人不能寢。戲目之曰：四時雷電鎮^[48]。

其中陶工多為外地之人，傭工為生。

景德鎮客戶多都昌縣人，本府（饒州）與撫州府及安徽之婺源縣、祁門縣習其業者，十僅一二，而本縣之人無几^[49]。

而明代廣東佛山鎮的冶鑄業，最為有名。

諸爐之鐵冶既成，皆輸佛山之埠。佛山俗善鼓鑄，其為錢，大者曰糖閘，深七深六牛一牛二，小者曰牛三牛四牛五。以五為一連曰五口，三為一連曰三口。無耳者曰牛魁，曰清古，時凡鑄有耳者不得鑄無耳者，鑄無耳者不得鑄有耳者，兼鑄之必訟。鑄成時，……鬻于江楚。……其炒鉄則以生鉄团之入爐，火燒透紅，乃出而置砧上，一人鉗之，二三人錘之，旁十余童子扇之，童子必唱歌不輟，然後可煉熟而為錢也。計炒鉄之肆有數十，人有數千，一肆數十砧，一砧有十余人，是為小爐。爐有大小，以鉄有生有熟也。故夫治生鉄者，大爐之事也，治熟鉄者小爐之事也^[50]。

又說：

佛山多冶，業冶者必候其工而求之，極其尊奉。有弗得則不敢自專，專亦弗當，故佛山之冶遍天下。石灣多陶，業陶者亦必候其工而求之，其尊奉之一如冶，故石灣之陶遍二廣及海外之國^[51]。